



孔子孝论的汉代异化

——从“以孝入律”视角进行探析

◎ 孔祥安

【摘要】 汉代采取“以孝入律”的强制措施，大力推行“以孝治天下”治国之策，儒家孝伦理逐渐被汉律化。为此孔子儒家孝论在汉代发生很大变化，乃至异化。以现代法学的视角，从行政法、刑法、民法、诉讼法几方面梳理孝伦理的汉代律令化，探讨孔子孝论在汉代的异化及其社会影响，对于正确理解和把握孔子孝论的内涵和实质，厘清原始儒学与后世儒学的区别，正本清源，从而汲取孔子孝论之精华，弘扬中华“孝文化”，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关键词】 孔子；孝论；汉律化；异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 B2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1)06-0115-5

史家称“汉代以孝治天下”，学界对此十分关注。但关于孔子孝论的汉代异化探析较少。对于这一相对比较复杂的问题，借鉴专家学者研究成果，试从汉代“以孝入律”的视角做以探讨，以求教方家。

—

孝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其源远流长。然而，儒家孝伦理的基本思想体系是由先哲孔子创立的，经曾孟荀不断发展和完善。迨至汉

代“以孝治天下”，孝在律令中有了具体而明确规定，不断实现了“以孝入律”，孝才发挥出明显的治世功能。

孝融入汉代律令的过程，是一个渐变和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不再赘述。关于汉代“以孝入律”这一问题，依据现存的史料，以现代法学的视角从行政法、刑法、民法和诉讼法几方面做以简要梳理。

从行政法学的视角看，孝是从教化、吏制、养老、奖励等方面法律化的。为教化民众，汉初就设

〔作者简介〕孔祥安，中国孔子研究院学术研究部部长，副研究员，山东 曲阜 273100。

置了“三老”、“孝悌”等专职官员,宣传孝道,弘扬孝悌。如《汉书·高帝纪》记载:“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

《汉书·文帝纪》亦载:“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导民焉。”《后汉书·百官志》又载:“设置三老以掌教化。”乡以下设里正、伍长等官吏,如韩延寿为东郡太守时曾“置正、伍长,相率以孝悌。”(《汉书·韩延寿传》)其次,把《孝经》列为学校的基本教材,作为学生的必读书目。为让皇家子弟传习儒家经典,文帝时在京师设立了博士。在地方的庠序设经师,传授《孝经》。如《汉书·平帝纪》记载:平帝元始三年立学官,“序、庠置《孝经》师一人。”故荀爽说:“汉制使天下诵《孝经》。”(《后汉书·荀淑传》)

在吏制上,首创了“举孝廉”制度。如《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从此,“兴廉举孝,庶几成风”(《汉书·武帝纪》)。如王吉“少好学,明经,以郡吏举孝廉为郎”(《汉书·王吉传》)。孝也是考核官吏的重要标准。如《汉书·何武传》记载:“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曰:‘君掌错烦苛,不合众心,孝声不闻,恶名流行,无以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绶,罢归就国。’”甚至最高统治者皇帝也不例外,如《汉书·霍光传》记载:“昌邑王服丧期间,无悲哀之心,行淫乱,游戏作乐,被废帝位。”此外,“举孝廉”还是地方官吏之职责,否则会受到处罚。如《汉书·武帝纪》记载:“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

为倡行养老、敬老,颁布了较多的养老法令。如《汉书·文帝纪》记载:“年八十以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又如《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命郡国有谷者,给禀高年、鰥、寡、孤、独及笃癯、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律。”此时,汉代养老制度已由诏令变成“律”了。其次,给予年老者一些特权,如《汉书·惠帝纪》记载:“民年七十以上有罪当刑者,皆完之。”对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免

于法律制裁。此外,还有赐“王杖”制度,赋予持王杖者很高的荣誉特权。如持王杖者可享有“比六百石”的经济待遇,可“入官府不趋”等^[1]。

刑法上对不孝有很多条文规定。第一,不供养父母。如汉武帝时,兄弟二人按月轮流赡养其父,交替之时,双方相互攻击赡养不周,致使其父体瘦,告于官府。董仲舒认为兄弟赡养父,互相攻击,实属不孝,处以弃市^[2]。第二,殴杀父母。如《张家山汉墓竹简贼律》记载:“子贼杀父母,奴婢贼杀伤主、主父母妻子,皆梟其首市。”第三,举告或诬告父母。如《汉书·衡山王赐传》记载:“衡山王刘赐废太子刘爽,立次子刘孝,并欲与淮南王刘安联合谋反,刘爽将其父谋反之事告发,刘爽告王父,不孝,弃市。”诬告父母要比举告父母的处罚重,一般处以“大逆无道”之罪。第四,匿父母亡不发丧。如《汉书·李燮传》记载:甄邵任职期间,母丧,为不影响升迁,将母尸体埋进马棚,待升迁后为母置办丧事。事发后,被判处废锢终身。第五,服丧娶妻妾、生子及行奸作乐。如《后汉书·宗室四王之侯列传》记载:“元初五年,封乾(赵王)之弟为亭侯。是岁,赵相奏乾居父丧私聘小妾,又白衣出司马门,坐削中丘县。”第六,强奸继母。如《汉书·王尊传》记载:美阳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儿常以我为妻,妒笞我。”其假子被悬之以树,乱箭射死。第七,诽议孝行。如《后汉书·孔融传》记载:孔融因与他人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瓦中,出则离矣。”孔融被定“大逆无道”之罪,弃市。第八,对殴辱持王杖者,处“大逆无道”之罪,弃市^[3]。

民事法中亦有孝的规定,第一,父母依法享有对子女的人身支配权,可以买卖、管教,甚至杀戮。汉高祖曾公布诏令:“民得卖子。”(《汉书·高帝纪》)这也许是汉初灾荒之年的特殊政策,但从事实上肯定了卖子行为的合法性。在一定情况下,父母甚至还有杀子权。如《汉书·金日磾传》记载:金日磾因其子行为不轨,大义灭亲,将儿子杀死,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制裁,而且受到武帝的敬

佩。第二,父母对家庭财产具有处置权。汉律规定:“诸当占租者,家长身各以其物占,占不以实,家长不身自书,皆罚金二斤,没人所不自占物及贾钱县官也。”(《汉书·昭帝纪》)第三,父母对子女享有支配婚姻权。如《太平御览》中记载了一则由董仲舒依《春秋》经义审理的案件:甲的丈夫出海死于海难不得葬,甲由其母亲做主再嫁了。夫死未葬而妻改嫁,依汉律应当弃市。但董仲舒认为甲无罪。其理由为:“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甲又尊者所嫁,无淫乱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故“不当坐”^[4]。可以看出,父母主婚无罪。

诉讼法亦体现孝的精神,第一,亲亲得相首匿。如《汉书·宣帝纪》记载:“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此后成为汉代定制,终汉未改。第二,老人犯罪可以适当宽宥。如《汉书·惠帝纪》记载:“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第三,无子听妻入狱。如《太平御览》卷643引《东观记》载:“鲍昱为滋阳长,县人赵坚杀人系狱,其母诣昱,自言年七十余,惟有一子,适新娶,今系狱当死,长无种类,涕泣求哀。昱怜其言,令将妻入狱,遂妊身有子。”第四,允许子孙兄弟代刑。孝文帝时,缙紫代刑救父的故事,则是人们所熟知的案例。此后这一子孙兄弟代刑,被汉代在司法实践中遵循。第五,允许犯人回家奔丧。如《后汉书·钟离意传》记载:“民人防广为父报仇杀人入狱,关押期间遇母丧,防广悲伤不已,县令钟离意释放防广归家置办丧事。葬毕,防广自动归狱。”第六,宽宥复仇。如《后汉书·张敏传》记载:“建初中,有人辱人父者,而其子杀之,肃宗贯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后因以为比,遂定其议以为轻辱法。”可见,宽宥复仇几乎成了汉代处理类似案件的通例。

二

汉代“以孝入律”,推动了“以孝治天下”,但孔子之孝论在汉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乃至异化,同时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1、孝发展为追求功名利禄的手段,彰显功利色彩。

孔子主张子女不仅要尽力奉养父母,而且要“孝敬”父母,对父母还要有真实的感情、和颜悦色、面带婉容。如《礼记·祭义》中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孔子也说:“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礼记·檀弓下》)在回答子夏问孝亦说:“色难。”(《论语·为政》)这是孔子提倡的“色养”,即精神赡养,亦是最高层次的孝行。

孔子提倡子女对父母谏诤,主张“事父母几谏”(《论语·里仁》),其目的:“父有谏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孝经·谏诤章》)由是看出,孔子的谏诤思想是一种非常理性自觉地爱父母的表现,体现出孝子对父母至真至纯的自然血缘之情。

“举孝廉”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孝这一传统美德的发展,促进了人们的孝行。然而,一些追求功名利禄之徒,为了骗取虚假的孝名,捞取功名利禄,挖空心思,曲意逢迎,从而导致了伪孝现象的滋生和泛滥。尤其东汉,此种现象比较严重,甚至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怪现象^[5]。这与孔子孝论提倡的“孝敬”大相径庭。

2、“父慈子孝”发展为父权独尊,彰显尊卑关系。

孔子重视孝悌,强调孝敬,但也提出了父母对子女要慈。他认为孝是子女对父母的义务,慈是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即是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君臣父子应遵循各自的行为规范。如《大学》载:“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从某种意义上说,父慈子孝是条件和因果的关系,不但赋予子女孝敬父母的责任义务,而且赋有对父母德行的合理需求和自我的人格独立。

汉代律令赋予父家长一系列权利,形成了父权独尊的局面,严重影响了汉代家庭生活,使原

本平等和睦的家庭变得尊卑分明、秩序俨然。如西汉时，“石君石奋家子孙胜冠在侧，虽燕必冠，申申如也；僮仆诉诉如也”（《汉书·石奋传》）；东汉樊重的家庭亦如此，“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后汉书·樊宏传》）。这不仅对子女的思想感情和行为造成了极大压抑和限制，而且使子女对父母产生极端依赖性，严重缺乏独立思维和创新的能力，非常不利于子女心理健康发展和独立人格的培养。

3、“居丧过礼”，彰显厚葬之风。

孔子认为丧葬是情感的一种表达方式，是教化民风的手段。他认为“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丧，致乎哀而止”（《论语·八佾》），对爱徒颜回的去世，以“哭之恸”的方式表达其悲伤之情，甚至连呼“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子张》）孔子主张“三年之丧”，认为这是子女对父母养育之恩的自然回报。理由是“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阳货》）。并且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即“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可看，孔子从“亲亲”、“感恩”这一自然血缘“亲情”为子女行孝的动机找到了合理的理论根据，从教化的角度理性地阐释了“三年之丧”的社会必要性。孔子的丧葬观，注重现实社会生活，反对不切实际的厚葬，强调血亲之间的哀伤之情，提倡送死而不伤生。

汉代尤其东汉非常重视丧葬，对孝子服丧做了许多规定，上至皇帝下至庶人都要严格遵守，“居丧过礼”是当时人们追求孝行的最高境界。如东汉清河王刘庆，“及帝崩，庆号泣前殿，呕血数升，因以发病”（《后汉书·章帝八王传》）。此类的孝行被当时公认为“至孝”，甚至鼓吹“丧亲自尽，孝子终也”（《后汉书·荀淑传》），从而把孝的观念引向极端的误区。

关于“三年之丧”，统治者亦大力倡导和褒扬。哀帝曾下诏曰：“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汉书·哀帝纪》）公卿大臣遇父母之丧，往往是居官则去职，除官则不赴。^[6]正是这样，“三年之丧”制被写进了刘汉皇朝法典的《白虎通义》，致

使厚葬之风、攀比之风盛行。王符曾揭露当时厚葬等丑恶现象：“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槨梓槨，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宠臣贵戚，州郡世家，无增于孝行，但作烦搅扰，伤害吏民。”^[7]

东汉的士人也曾反对厚葬，提倡孔子的薄葬。如王充在《论衡·薄葬》中强调：“贤圣之业，皆以薄葬为务。”^[8]东汉的最高统治者亦倡导薄葬。如明帝诏禁厚葬曰：“昔曾、闵奉亲，竭欢致养；仲尼葬子，有棺无槨。”（《后汉书·明帝纪》）但未能遏止住厚葬之风的蔓延。

4、复仇之风盛行，彰显社会矛盾。

汉代强调子女的孝行，对为亲复仇者又多实行宽宥，以致助长了人们的复仇心理。特别是东汉，复仇活动非常频繁。如前《后汉书·张敏传》记载的案例。也如学者说的：“就实体法而言，禁止复仇，杀人者处死是汉律的主流。但若从程序法角度观之则又不尽然。对于复仇者先依法加以拘捕，然后再通过多各种途径和方式宽宥之，几乎成了汉代处理此类案件的规律。可见，宽宥复仇才是汉代法律的内在精神。”^[9]复仇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人们的偏执和过狂，严重损害了法律尊严和政治权威，影响了社会秩序，激化了各种矛盾。

汉统治者对此也有清楚地认识，桓谭曾建议光武帝：“今人相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仇，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虽有怯弱，犹勉而行之，此为听人自理而复法禁者也。今宜申明旧令，若已伏官诛，而私相伤害杀者，虽一身逃亡，皆徙家属于边，其相伤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赎罪。如此，则仇怨自解，盗贼息矣。”（《后汉书·桓谭传》）可见，“道义与法律的冲突，将执法者推入一种两难的境地。从道义，不是从法，每个执法者都将面临着这种选择，选择的结果必然是法制的混乱。”^[10]最终结果是复仇之风非常盛行。这与孔子推崇的“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论语·公冶长》），提倡的

“以直报怨”(《论语·宪问》),主张的“和为贵”(《论语·学而》),显得格格不入。

余 论

孔子儒家孝伦理的汉律化,对稳定社会秩序、敦化社会风俗、促进家庭和睦,有较大的积极作用,但也促使了伪孝、厚葬、复仇等社会陋习的滋生和蔓延。这不但败坏了当时社会风气,而且发展成中国封建社会“愚忠”、“愚孝”的滥觞,

对此后中国社会伦理道德以及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亦不难看出,孔子提倡的“亲亲之爱”、“父慈子孝”、“戚丧致哀”、“以和为贵”等孝观念在汉代发生了很大变异。

然而,充分认识孔子孝论的汉代异化,正确理解和把握其内涵和实质,厘清原始儒学与后世儒学的区别,正本清源,对汲取孔子孝论之精华,弘扬中华“孝的文化”^[11],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 [1] [3] 朱红林.汉代“七十赐杖”制度及相关问题考辨[J].东南文化, 2006, (4).
- [2] 宁汉林.中国刑法简史[M].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7.310.
- [4] (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M].北京: 中华书局, 1985.1772.
- [5] (东晋)葛洪著,杨照明校.抱朴子外篇校笺[M].北京: 中华书局, 1991.393.
- [6] 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159—169.
- [7] (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 中华书局, 1965.1637.
- [8] 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 中华书局, 1990.961.
- [9] 侯欣一.孝与汉代法律[J].法学研究, 1998, (4).
- [10] 侯欣一.孝与汉代社会及法律[A].法律史论集[C].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8.96.
- [11]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258.

(责任编辑 李远国)